

doi:10.3969/j.issn.1674-117X.2019.06.003

形式探索与传统的复归

——论马笑泉《银行档案》叙事策略

唐东堰, 周秋月

(东华理工大学 文法学院, 江西 南昌 330013)

摘要: 马笑泉小说《银行档案》, 以“档案体”这一新颖的形式, 讲述了一个小县城银行29名职工在改革开放后的命运浮沉, 小说在文体上具有鲜明的先锋性。叙事策略上, 作者舍弃全知视角, 采取了留白的外视角, 将中国画散点透视的方法融入到小说叙事当中, 从传统艺术技巧发掘先锋的因子, 实现了小说形式上的先锋性与叙事上的传统性的有机融合, 为中国文学的本土叙事经验先锋化提供了一种有益的尝试。

关键词: 《银行档案》; “档案体”; 叙事策略; 本土叙事; 散点透视

中图分类号: I207.4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4-117X(2019)06-0014-04

引用格式: 唐东堰, 周秋月. 形式探索与传统的复归: 论马笑泉《银行档案》叙事策略 [J].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24(6): 14-17.

Form Exploration and Return of Tradition: On the Narrative Strategy of Ma Xiaquan's *Bank Archives*

TANG Dongyan, ZHOU Qiuyue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and Law,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Nanchang 330000, China)

Abstract: Ma Xiaquan's novel *Bank Archives* tells the story of the fate of 29 employees of a small county bank after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in the form of "archives style". The novel is of distinctive vanguard in style. In narrative strategy, the author abandons the omniscient angle of view and adopts the blank external angle of view, integrating the cavalier perspective of Chinese painting into the narrative of novels, exploring the avant-garde factors from the traditional artistic techniques, and realizing the organic integration of the avant-garde in the form of novels and the traditional narrative, thus providing a beneficial attempt for the avant-garde of the local narrative experience of Chinese literature.

Keywords: *Bank Archives*; archives style; narrative strategy; local narrative; cavalier perspective

收稿日期: 2019-10-05

基金项目: 湖南省社科成果评审委员会项目“中国现代作家的民族国家意识与文学创作关联研究”(XSP18YBZ067)

作者简介: 唐东堰(1981—), 男, 湖南永州人, 东华理工大学副教授, 博士, 硕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周秋月(1995—), 女, 四川宜宾人, 东华理工大学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银行档案》作为马笑泉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创作于中国当代小说形式的先锋探索日趋淡漠的新世纪。在先锋探索日益衰退、商业化小说兴起的背景下,《银行档案》却于形式上进行先锋探索,首创“档案体”。小说不仅在形式上别具一格,叙事内容上也竭力在平实中力求引人入胜,作者力图在叙事先锋性与叙事张力之间保持某种平衡。

一 外视角的“档案体”

“档案”一词原指分类保存以备考察的文件和材料,“档案体”,顾名思义,是以档案录入的方式将描写对象的信息资料逐条记录在册,为再现人物历史和人事关系提供客观材料。档案也分多种,《银行档案》的“档案”更接近于机关个人档案,即用人单位用于了解一个人个人情况的资料。档案一般由官方书写与保存,因此档案的叙事视角多为全知零视角。

《银行档案》使用第三人称叙事,作者看似也要做一个“全知全能”的叙述者。如果真是这样的话,读者就只是被动地接受故事和讲述,但作者并没有这样做,而是采用了第三人称的外视角。这一视角令作者紧紧跟随在人物的后面向读者叙述人物的行为和语言,但并不解释和说明人物隐蔽的一切。《银行档案》将飞龙人民银行29名员工进行编号并挨个书写,这其中开篇001号便是银行行长龙向阳。在第一份档案中书写龙向阳个人命运浮沉的同时,整个银行的人事与变革也被缓缓带出,但背后隐藏的故事,如龙向阳被抓的更深层内幕却被隐藏了起来,给读者留下了想象的空间。除此之外,在《银行档案》里,几乎每一份档案的结尾都在为后文埋下伏笔,设置悬念,耐人寻味。如在002号王庆生,即龙向阳倒台后的接替者的档案结尾,写到银行两名职员的话:

“散会后,有人在背后偷偷说,黄主席这次替我们挨了打,干脆让他当行长算了。另外一个人叹了口气说,黄主席比王行长灵活得多,可惜犯过错误,上面不得准他当喽。远远地看见第三人走过来,两个忧国忧民之士对视一眼,把话题扯开了。”^{[1]19-20} 他们把话题一扯开,黄主席究竟犯过什么错也暂时无从得知了。作者好似和读者一样,是一个对内情一无所知的人,写到这里便收了笔,前因后果到底如何,还得读者继续阅读寻求答案。

这使得叙事极富戏剧性和直观演示性,改变了“档案体”本身平铺直叙的枯燥和“全知全能”的老套。面对众多空白与未知,读者原本对于“档案体”全知的期待视野受到冲击,新的期待视野在一次次伏笔中更新形成。

一般说来,外视角的叙事模式也会有它难以避免的缺陷,那便是人物内心描写会受到限制,不利于作者对人物形象进行更加全面而深刻的刻画,但这一缺陷在“档案体”这一独特文体之中竟然不成为其缺陷了。《银行档案》一共写了飞龙银行职工的29份档案,作者着墨多者也不过十几页,少则四五页。众多人物并列,叙述篇幅有限,要在有限的篇幅中既将人物主要档案记录详尽,又将人物形象刻画细腻的话,其谋篇布局、一笔一墨乃至“力道”都要恰到好处才行。再者,“档案”作为官方材料,叙述时原本就不需要作者作过多的介入,也无需掺入太多私人情感。因此,多余的心理描写在“档案体”这一特殊文体中并无必要。就拿龙向阳因贪污被人举报而锒铛入狱来说,作为飞龙县一方诸侯,他的突然倒台所带来的本人情感的变化并不被考虑在书写范围之类,只需作者客观直白一句“龙向阳两个颧骨更加高了”就足已表达其背后曲折难言的心理感受。总之,原本作为外视角缺陷的心理描写的缺乏,在“档案”体中却显得极为自然、合理。

出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马笑泉深受20世纪80年代先锋文学观念的影响,在一篇创作谈中他曾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马原、苏童、余华、格非等一批先锋作家,费了很大的力气,才恢复了中国小说的形式感,到了本世纪,却出现了一种很危险的倾向,就是一切向市场销售量看齐。为了取悦读者,扩大销售量,很多纯文学作家都自觉从小说退回到故事,生怕读者看不懂,取消了对小说形式的探索。”^[2]在他看来,新世纪的小说创作已走向追求市场、取悦读者的道路,而秉持“纯文学”理念的他则力求在保持内容具有吸引力的同时兼顾形式的创新,这部《银行档案》便足以看出他对小说形式的创新追求与“纯文学”理念的坚守。在马笑泉创作“档案体”小说之前,同样作为湘籍作家的韩少功已在1996年开创了以词典语言进行叙事的小说《马桥词典》。《马桥词典》作为对传统小说文体的一次成功颠覆,在九十年

代末引起评论界热议。“词典体”的新不仅新在“词典”一词,更重要的是在小说里,语言成为一种展示对象被书写,小说的叙述被包含在对于语言的展示之中,一个个词条将叙事推到极致。与《马桥词典》相比,《银行档案》所开创的“档案体”看似形式创新,实则并未完全超越一般叙事的框架与藩篱。“写法尽管假‘档案’之名,其实与中国传统小说的形式基本如出一辙。‘形同长篇,实为短制’。”^[3]抛开“档案”这一题名,抛开从001到029的归档目录,可以将之看作一部由各小节分人物进行描写的飞龙县人民银行职工错综复杂关系网的长篇小说,或将之看作29部人物短记也未尝不可。总之,“档案体”这一文体的创新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力度是不够的,毕竟它是出现在韩少功所开创的“词典体”之后的体式。好在作者并不单单执着于对小说形式的单一探索,其也着力于叙事内容的丰富,力求做到内容与形式的契合。

二 主线与群像兼顾

前文提到《银行档案》“形同长篇,实为短制”,即一份档案作为个人的历史记录,各篇相对独立且完整。一部《银行档案》由银行整整29名员工的个人档案组合而成,人物群像如同多声部合唱,共同呈现银行历史与“单位人”的生活真相。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整体结构散乱无序,恰好相反,作者在整体结构的把握上可谓煞费苦心。

《银行档案》由飞龙县人民银行29篇职工群体的档案组成,一个人一份档案的主体,或者说是一节小说的主角,“打破了一部小说中只有一个主角的叙述惯例。”^{[4]55}在一节里,他是绝对的主角,故事情节围绕着他而展开。人物性,被作者在短短一节中雕刻得栩栩如生,令读者印象深刻,如擅长弄权的世俗强人龙向阳,为人圆滑得像条“老泥鳅”的黄建国,拥有江湖侠气的屈红旗,其貌不扬但本事缠身、淡定超脱的赵小科等等。其人物众多、性格各异,读起来却可触可感,真实得如闻其声、如见其人。这一点得益于马笑泉的个人经历,毕业于湖南银行学校的他曾在武冈、邵东人民银行工作,这一段经历为《银行档案》的创作提供了一手素材。总之,《银行档案》用散点透视的方法给读者展现了一幅县城“基层

精英”^{[5]27}的画卷。

一方面小说的主人公不是单一的,另一方面作为长篇小说主角分散而众多,若没有主线的连接很容易瓦解小说的整体布局。《银行档案》的主线有些隐蔽,因为小说以档案形式进行书写,所以也不会有固定的时间主线,每一份档案的时间线都是以个人为轴心且独立的。在谈论到《银行档案》的主角问题时,马笑泉曾说:“焦点透视的一个好处,是可以集中透彻地写一个人,集中透彻地写一件事情,但其实这是跟生活本相相违背的。我写每一个人都把他作为主角来写,既然每个人都是主角了,每一个人也都不是主角,他们只是这个棋盘中的一个棋子,这是生活的本相。”^{[5]27}因此,《银行档案》的主线其实就是“银行生活”,银行作为所有人物共同工作的场所,连接起一张银行关系网,人物之间互相缠绕、彼此浸染。我们总能在一份档案里就看到其他档案主角的身影,银行工作的圈子决定了他们在人事关系上的固然联系;所以在张凤华的档案里,会出现龙向阳、尹桂花、赵人瑞、宋小红等,同样,在龙向阳、尹桂花、赵人瑞、宋小红的档案里也或多或少地会出现张凤华的身影,所有的描绘汇集起来方构成一个完整、全面的人物形象。在结构与出场方式上作者也有精巧的构思,如上文所提及的每一份档案的最后,作者都会巧妙地引出下一名叙述对象,即一则档案最后的出场人物也是下一份档案的主角。如此环环相扣、紧密连贯,极为巧妙地将每部档案联系在了一起。除此之外,原本从001号人物龙向阳那里读者便对飞龙县人民银行的人事和变革有了初步的了解,但作者在叙事过程中不断设置悬念,引起读者继续阅读的期待,使其不会因为看似单一的“档案”型叙事而失去阅读兴趣。以“银行”关系网为主线,档案间再环环相扣,并于叙事中间设置无数具有“不确定性”的岔路,岔路与岔路之间相连接,共同构成银行关系网,共同组成这一部看似分散而又完整紧密的长篇“档案体”小说。“档案体”小说可以说是表现复杂现实生活的一种新的有效的小说样式。

三 传统特质的融入

初步接触此小说,读者很容易被“档案体”这

一先锋性和独创性的形式迷惑, 认为《银行档案》追求全新的体式, 颇受西方现代派小说的影响, 现代派气息浓郁。事实上, 它与中国传统的联系更为紧密, 甚至可以说其与中国传统艺术程式一脉相承。就拿小说描写人物所使用的“散点透视”方法来说, 这种方法本身就是中国画的独特方法。

身为回族且长期在小县城生活的马笑泉所接触到的更多也是传统的文化因子。方言书写所带来的地域色彩自不必多说, 对民间生活的人文关怀也不必言, 传统书法和侠义之风是他小说中最常出现的元素。就拿他的另一长篇小说《迷城》来讲, 明明是官场小说, 却极大程度地融入传统书法文化与茶文化。而在他的短篇小说中, 也有诸多篇章的主题与侠义有关, 如《回身掌》《断魂枪》。在《银行档案》中, 这两样元素也有书写。在银行 29 名职员中, 胡伟的哥们儿义气、屈红旗的江湖侠气都是让人读完之后很难忘的。凡是遇到可以描写具体“武斗”场面的时候, 作者也绝不放过展现自己广读武侠小说所积累的功底的机会, 有“左侧部上前, 身子别住他抬起上踢的右脚, 右边起推, 一个膝撞, 在他左侧麻筋处顶了一下”^[1]⁴⁴ 这样的“武斗”描写, 也有“领导们练的是云里雾里的太极拳, 他练的是直来直去的铁砂掌”^[1]⁴⁷ 这样与武侠有关的生动比喻。书法文化在写到赵人瑞的时候有所涉及, 但却并没有深入展开。另有银行“神人”赵小科, 更让人想到作者在其另一部小说《巫地传说》中所描绘的颇具神秘色彩的异人, 也很容易让人联想起阿城《棋王》中的王一生来, 他们都达到了“汇道禅于一炉, 神机妙算”的境界。而那种对业务的精通和熟练的程度, 以及对于传统文化的无比虔诚、执著的精神境界, 明显地包含着古老的庄禅文化内核^[4]⁵⁷。最后, 作者对亲属团们“迷信”、组队烧香、戴檀木菩萨等的描写也属于民俗文化融入叙事这一范畴。这些传统文化的描写虽不及马笑泉后来所创作的小说那样占比多、融合得贴切, 但也能从

中看出作者一直以来对文化遗产的思考, 以及他力图扩大小说叙事阐释空间的追求。

马笑泉认为, “优秀的小说在叙事表层下起码有一个文化结构在支撑, 比文化结构更深层的是精神结构。”^[6] 长篇小说的叙事在形式与内容之外, 必得有一股精神气作为支撑。传统特质的融入, 讲中国故事, 写中国韵味, 是作者的追求; 正因如此, 小说的深度和氛围才更加突出, 这样的叙事才更有特色、也更有深层意义。

总体来说, 《银行档案》的形式是新异的, 但叙事是日常化的。其没有高潮迭起, 也没有波澜壮阔, 没有大喜大悲的情绪波动, 也没有大起大伏的矛盾冲突, 小说先锋性与可读性兼备。形式上, 作者勇于探索, 首创“档案”体, 但在叙事视角上并没有使用“档案”所固有的全知视角, 而是使用更多留白的外视角; 结构上, 采用主线与群像兼顾的方式, 使人物形象饱满丰富, 同时也使小说不因“散点透视”而结构涣散; 叙事内容上, 小说融入诸多传统特质, 力求凸显小说深层次精神结构。坚守传统与探索新质兼顾, 使得小说极具感染力和冲击力, 可以说, 《银行档案》在叙事策略上是成功的。

参考文献:

- [1] 马笑泉. 银行档案 [M].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8.
- [2] 马笑泉. 语言、形式和意境 [J]. 理论与创作, 2008(5): 76.
- [3] 刘涛. 或巫或侠: 马笑泉论 [J]. 西湖, 2012(8): 105.
- [4] 张建安. 回族作家马笑泉小说论 [J]. 民族文学研究, 2014(2): 55.
- [5] 袁复生. 梅山文化、小城与文学: 马笑泉访谈录 [J]. 创作与评论, 2013(21).
- [6] 张艳梅. 马笑泉小说之“迷” [J]. 百家评论, 2018(3): 97.

责任编辑: 黄声波